

第二章 终于被俘

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对荆门战役作了如下报道：

江汉我军攻克荆门 俘国民党匪军三千

【新华社中原十日电】江汉人民解放军四日攻克宜昌东北的荆门县城，歼敌国民党七十九军指挥所及该军九十八师的二九四团，俘该军军长方靖以下三千余人。上月廿一日解放军解放宜城后，匪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即令七十九军于二十五日起自荆门北向宜城、南漳以南地区扫荡。解放军挥师南下，于一日将该军包围于荆门县城及附近地区。四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攻击，至该日黄昏，即全部占领荆门。现解放军正继续向其余被围之敌攻击中。

这则报道准确无误。

那么，上一章说到方靖在战场上举枪自杀一节又作何解释呢？这就用得上旧武侠小说中的形容词——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！正当方靖举起手枪时，早已提防的李印玺跟着跃起，一把拽住，硬把手枪夺下来：“钩座！钩座！我们已作全力抵抗，尽到了军人的职责。时值今日，您还为谁殉职呢？”方靖胸中的一股邪气下泄了，长叹一声，随之泪珠滚滚而下。

李印玺掏出白手帕高擎挥舞。这时尚伏在田埂上的三人之一还在犟劲：“就这样算了吗？！就这样完了吗？！”方靖垂着头向那人摆摆手。

解放军围上来了。

李印玺用身子护住方靖：“我身后是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。请你们的长官出面答话。”

解放军的连长站出来对李印玺说：“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优待方军长。”李印玺这才闪身向连长介绍了方靖。解放军连长对方靖说：“我们欢迎你过来，请随我去见团长吧！”

这时四面枪声嘎然停止。因为尽管方靖脱离了战斗部队，但是彼此遥遥可见。李印玺挥动白手帕后，七十九军被围官兵知道他们的军长投诚了，他们也就不再抵抗。

没有搜身，也没有捆绑。解放军连长对方靖说：“请你走在我们队伍中间。因为这里很乱，要防备流弹伤着你。”话声刚了，解放军战士纷纷上前，将方靖围在核心。方靖那几乎凉透了的心猛地一热，冲击了全身快要凝结的血液。他明白，解放军连长这一措施，是防备他举白旗投诚后，会被部下开黑枪狙击。

大约走了五、六华里，来到江汉军区老八团临时指挥所。林团长见了方靖首先握手：“你能放下武器，我们欢迎。这里不便多谈，我派人送你去见我们的司令员张才干吧。”

沸腾的枪炮声和弥漫的硝烟，被降临的夜幕笼罩，除了他们一行人的步履声外，这初春的四周十分静寂。

从老八团临时指挥所到江汉军区临时指挥所的途中，只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护送，已不象刚才在战场上那么紧张了。

方靖此时只想一件事：直到现在的待遇，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，到了司令部大概就要受审了。“我是堂堂国军中将，决不接受侮辱！”他决定假如在受审时受到人身侮辱，他就以自杀来抗议。由此他又想到自己应该从一开始便持强硬态度。“战是打输了，志气不能输！可惜我没有穿将军服，难于保持将军的仪容。”他想就现有的装束，好好整理一下，以显示他的“从容”。

“我要象《白门楼》里的张辽那样，昂首进帐，以傲词与曹操对话！”他端正了军帽，扯扯上衣下摆，觉得自己穿的是一套新军装，也够气派的，唯一的缺点是刚才伏在田埂上抵抗，把新军装弄脏了。于是双手在身上一阵拍打，无意中触到上衣口袋里一包坚硬的东西，这才想起身上还带有二十两黄金。

方靖收藏黄金的“癖好”，自然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而培养起来的。军需官知道他的“癖好”，一弄到钱就替他买成黄金。部队到达荆门后，军需官便去沙市替他购得黄金四十两。原本这四十两黄金都带在身上，只因另外的二十两装在外罩的一件军用茄克口袋里，开始突围时，行动不便，他脱下茄克，交给随从中尉副官宋多胜拿着。军部被冲散后，

宋多胜不知去向，那二十两黄金也就被宋多胜带跑了。现在他非但不惋惜，就连在身上带的这二十两，也成了他一块心病。他根本不相信解放军真会优待他。他暗想：“现在确实没有搜身，但终不免要搜身的。倘若到了对方司令部，当着我的部下搜出黄金来，平时自己标榜如何清正廉洁的谎言，岂非不揭自穿！做了俘虏以后被人识破，既会引起部下们的愤恨，也会使共军耻笑，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。”他决心把这些他过去拼命收储的东西抛弃！他的另一个口袋里还装着一本笔记本，那上面记载着许多军事机密，如果被解放军搜去，将对十四兵团和友军都十分不利，因此他先掏出笔记本来，一页一页撕碎了抛洒在路旁。看看解放军战士并没有阻止的意思，又掏出黄金来，胡乱投入道旁的池塘中。

江汉军区司令部临时指挥所是在一个村庄里。方靖等人被带进院子稍候片刻，解放军班长走来说：“司令员请方军长进屋去谈话。”

被俘后的 第一堂课

室内点着两盏桐油灯，仍嫌光线不足。方靖在门外屏了屏气才走进去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看见有三个穿解放军制服的中年人站在桌前。因为他早已拿定主意，所以进屋后便摆出公鸡斗架的姿势，心想：“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！”却不料那三位解放军含着笑轻轻鼓掌，异口同声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这意外的场面，使方靖那紧张到极点的神经，受到了极度刺激，以至大脑反应失灵，傻子似的不知所措。

那位最先和方靖握手的解放军向方靖介绍其它两位：“这位

是我们的张政委；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长沈德纯。我叫张才干。”说罢便拉方靖去桌前坐下。

在此时，十分敏感的方靖觉察到自己是背门而坐，对方三位成品字形，张司令员面对着他，于是想：“啊，这是三堂会审的格局，先礼后兵。这就要开始翻脸审问了！哼，休想从方靖嘴里得知半点军情！”他那双原本搁在膝部的手，下意识地举到桌面上，攥成了双拳。

张司令员问方靖：“你吸烟吗？”方靖生硬地回答了一个“不”字。“那么，等吃了饭再聊吧。”

稍顷，两个解放军战士提了饭盒进来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司令员请吃饭吧。”司令员摇摇头说：“不忙嘛！留下一份给方军长吃，其余的拿出去，给跟方军长过来的人吃——设法让他们吃好、吃饱。”

方靖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因为他清楚：打起仗来指挥官是顾不上吃饭的。这次战斗从拂晓前再次打响算起，到现在已是十多个小时了，他自己水米未沾，相信对方也不会不饿肚子。怎么可以设想把自己的饭菜让给还不到一小时前，真刀真枪和自己拼命搏杀的敌人呢？

当热气腾腾的饭菜摆在方靖面前，内心犟着的劲，一下子松弛了。他惶惶起立，含糊地说：“还是……还是你们先吃吧。”张司令员摇头和蔼地说：“不，还是你先吃——相信你比我们饿的时间更长些。”是的，当战斗顺利发展时，得胜的指挥官可以抽空吃点东西。他这个失败者的肚内早已空空如也，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，他也不再推辞了。

一盒米饭，两样素菜。直到后来看到给三位补送进来的饭菜与他吃的相同，他才确信这就是解放军将军的饮食标准。俗话说：“饥不择食。”尽管这饭菜离他这个国民党中将的饮食标准甚远，他还是吃了个碗底朝天。

饭后再加热茶下肚，全身都暖和了。方靖的脸上也开始解冻。

喝着茶聊天，气氛很轻松。张司令员以温和的态度，先问七十九军出川的情况。方靖来了神，他将出川后“势如破竹”叙述了一遍，有声有色，得意之极。他的意思在于提醒对方：

“七十九军是王牌部队，我方靖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你们可要弄清楚。”他忘了“败军之将不可言勇”，而且他也无法解释今日的一败涂地。

听的三位只是相对微笑，并不急于驳斥。

方靖讲完后，沈德纯部长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：“攻的目的在于取，取的意义在于得，请问你一路势如破竹，究竟得到了什么？”方靖瞠目结舌，不能措一词。“再请问：是阻止七十九军出川，让你们守着大巴山防线对我们有利，还是把你们调到这鄂西平原来歼灭对我们有利呢？”方靖的脸顿时火烧了起来。他必须承认：七十九军从安康出发，所谓的“势如破竹”，也不过是解放军让开一条路而已。等他们的部队过境后，解放军又复夺失地。如此看来，自己吹嘘的“所向无敌”，事实上是中了解放军的“调虎离山”之计，被解放军牵到荆门，陷入重围，终于被歼。他不觉冒出一句：“唉呀，惭愧！”

张司令员问方靖：“你估计现在十四兵团会作什么样的部

署？”方靖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十四兵团原作战方案是受到贵军强大压迫后，便退过长江去。我想在我军失败之后，他们必然会迅速渡江。”张司令员微笑摇头：“宋希濂不会那样软弱，也不会有此明智，否则，淮海战役后，为什么不下决心退过江去呢？”方靖很惊讶张司令员的高明见解。因为实际上宋希濂并不甘心失败，从他命令七十九军坚守待援的决定，也可以看出。张司令员又问：“依你看，此后鄂西战局将会怎样发展？”方靖略一思索后答道：“在江西第四次‘围剿’时，以精锐的十一师在草苔冈被歼而宣告失败。七十九军是十四兵团依靠的主力，现在被歼，其它各军决无斗志，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。”张司令员点点头说：“你能承认失败还算明智。既然如此，你愿不愿意写信去劝你的部下把部队带过来？我们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自由。”方靖考虑到大势已去，何必再作无谓的抵抗，徒使将士流血，老百姓遭殃呢？因此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方靖当即写了三封信，一封给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；一封给二九三团团团长康厚泽；一封给一九九师五九六团团团长蔡德治。三封信内容相同，大意说他已到解放军这边来了，蒋介石引退，“党国”大势已去，不必作无谓抵抗，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，把部队带过来，必有光明前途”等语。这是当时方靖所能认识到的“道理。”

信经解放军三位首长传阅，并未提出修改意见，当即封好，派人送出去。

最后，张司令员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就谈到这里吧。”又指着沈德纯对他说：“以后你有什么事，可以直接与沈部长联系。”

张司令员和张政委走后，沈部长对方靖说：“今晚要委屈你了——就和我在一张床铺上挤一挤吧。”方靖先听到“委屈”二字，不免有点紧张，以为要把他关押到什么地方去过夜。后来又听说同榻而眠，大大出乎意料，不禁心头一热，嗓子却有点发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沈部长说罢，转身去铺床，并说：“今晚来不及找被子了。我盖毛毯；你年纪大些，盖棉被。你睡在外侧，起床下床方便些。”

这样推诚相待，是方靖做梦也想不到的，因此他站在一旁发起愣来。沈部长躺下后催他，他转身解开棉衣时，触到腰间的一条子弹袋和一支勃朗林手枪。原来他的棉军衣肥大而手枪又小，所以始终未被人发现。此时在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罪恶的念头：拔枪先击毙共军的敌工部长然后自杀！他偷眼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沈德纯，同时右手缓缓伸向枪柄…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耳边突然响起了“解放军优待俘虏，交枪不杀”的喊声，他的手指颤抖了：“在战场上共军没有杀我，到这里以礼相待，我怎么能行此不义之事呢？当了俘虏还下此毒手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转念间他改变了主意：“还是用自己的枪了结残生吧！”他攥住了枪柄。

“方军长，你少脱点衣服，一条被子不够暖和，到下半夜会冷的。”

方靖愣了半晌，偷偷拭去溢出眼眶的泪水，迅速解下子弹袋：“沈部长，这枪……”沈部长十分平静地回答：“就放在桌上吧。”没有惊讶，没有斥责，方靖却感到比挨一记耳光还要沉

重。

如果说，解放军江汉军区三位首长给原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兼叙府、泸州、内江、自流井警备司令上了第一堂课，那么，第二堂课却是方靖为之卖命三十年之久的国民党蒋介石给他上的。

被俘后的 第二堂课

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，在江汉军区敌工部长沈德纯组织下，七十九军被俘军官数百名由荆门地区向江汉军区根据地大洪山转移。

中午，队伍正在前进，天空出现两架轰炸机，随即在这一队伍的上空低空盘旋多时，突然俯冲投弹，并以机枪扫射。当时“国军”的服装，尤其是军官戴的大盘军帽，与解放军的服装截然不同，不能设想低空盘旋多时的空军人员会分辨不清。再者，战场已向南移，不去轰炸敌军前沿，支持“国军”地面部队作战，却来轰炸这支队伍，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？难怪方靖在轰炸时一把扯开棉军衣，敞胸仰天，愤怒地喊叫：

“炸吧！炸吧！把我炸死，你们就可以在报上宣传我方靖为党国成仁了！”还是几个解放军战士冒着危险，边喊“方军长快隐蔽”，边将他拖下路旁排水沟，才幸免“成仁”。

由于激愤，方靖病倒了。沈部长命解放军战士以担架抬着他渡过唐河。

渡过唐河后，天降大雪，气温更低了。七十九军被俘军官们的行李都已丢失，一时无法寻找。解放军临时给了他们棉被或军毯，仍嫌单薄。这时正在作战，无法弄到更多的被毯。就是这些东西，也还是解放军把自己用的分出一部分照顾他们的。

当夜宿营在一个村庄里，这些被俘军官，便到老乡家去抢稻草，甚至翻箱倒柜乱拿乱抄，嘴里还干不净地骂骂咧咧：“他妈的，共产了！共产了！各取所需，不要客气嘛！”显然，御寒只是表面理由。

方靖卧病中闻讯赶去，只见负责警卫的一连解放军战士正在分头劝阻，并未动用武力；那些军官们却不听劝阻，故意将老乡家的东西从屋内拖出，抛洒满地。他气得大喝一声：“他妈的——立——正——！”七十九军的军官们自然是很熟悉方靖的声音的，下意识地原地立正了。“他妈的——统统拉去……”

“匪觉”二字由于骤然意识到处境而咽了回去，变成了一声长叹：“唉！要承认失败啊，不服气又当如何呢？自从江西‘围剿’以来，我们口口声声把人家共产党称做‘土匪’已经历时二十年了。现在你们干出这样的蠢事，究竟谁是土匪呢？”说罢，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

黑暗中沈部长走过去搀扶着还在发高烧的方靖。方靖余怒未息，恨恨地对沈部长说：“沈部长，我建议你采取严厉手段杀一儆百！”沈部长摇摇头：“这样骚扰百姓，在你们的军队里，大概不是前所未有的吧？”方靖倒也勇于承认：“是的，尤其是打了败仗的时候。”沈部长说：“就是嘛，你们过去也经常用杀一儆百的手段，并不能制止呀！我们主张以思想教育为主，就是要使犯错误的人，从思想上认识到他的行为是在犯罪，是可耻的。这自然要比一杀了事困难得多。我们相信思想教育是能够解决问题的。”

当时方靖不能信服，因为他也不能理解，他在“国军”中三十

三年，所见所闻，无一军官不是以严厉手段治军的。“思想教育”对他来讲，还是新名词。

次日晚上，沈部长告诉方靖：“那天派人去送你那三封信，都因为你的部下已率部撤退了，没有送到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你的表现还是好的。这对你的将来会有好处。”说到这里，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报纸递给方靖：“这报纸上登载了一篇王耀武在被俘后发表的告国民党军队公开信，你看看，能不能照样写一份？”

方靖当即推辞：“请容我考虑考虑。”沈部长听了一笑，便不再提此事。

王耀武发表公开信，方靖早有耳闻。他还听说蒋介石收听到王耀武在解放军电台的公开讲话时，气得把收音机也砸碎了！即便没有王耀武之例，方靖也可以找到前车之鉴：一九三六年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（在军队中称之为“委座西安蒙难”），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许多将领。内有黄埔一期将领曾扩晴很同情张、杨之举，在西安电台发表讲话，主张抗日。事后蒋介石大骂曾扩晴“无耻之尤”，从此不再重用。想当初蒋介石派曾扩晴去拉拢川军，是黄埔系统第一个委任为中将的得意之人，仅仅因为同情抗日，便遭到蒋介石如此记恨，方靖怎么会不担心：假如今日自己发表公开信，在四川的家小就有被蒋介石谋害的可能。况且他虽然承认失败，也承认国民党在大陆决无立足之地，但是要他当时就反蒋介石——陈诚，他还下不了这样的决心。

方靖还以为沈部长会进一步劝他。为找适当的借口推脱，

他绞尽了脑汁，搜遍了枯肠，很苦恼了几天。但是，沈部长虽然每天要去和他谈一两次话，却不再提此事。他暗自庆幸，却不知丧失了一个争取共产党和人民谅解、宽大处理的大好机会。

七十九军被俘军官有五、六百人之多，为了便于管理，沈部长做通了李印玺的思想工作，在队伍行进中途休息时，沈部长带李印玺到队前一一指认，于是战俘就分成了校官队和尉官队。在校官队中有二九二团团团长黎荣生；二九四团团团长黄德铸；五八二团团团长赵鹤庭等。

这一分开编队的措施使方靖骤然紧张起来，以为到了大洪山，会把他们关押在设有碉堡、铁丝网内的集中营里，也许修了一座地牢，单独关押他一个人，使他从此过不见天日的生活。由于精神负担过重，抬进大洪山后，有几天都不能起床活动。

惶惶不安

自然，在大洪山里，并没有什么集中营、地牢之类的设施，而是两所地主的大宅院，分住校官队和尉官队。校官队住在坡上大院，前院两排房子是被俘的校官们住着，后院是沈部长和管理人员住着；方靖住在小跨院里，他的日常生活有个解放军战士小李照顾。

直到住定以后，方靖的情绪才逐渐稳定，病也渐渐好了。这天起床，想去外面散步，刚走出跨院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。料想又是自己的部下在闹事了，此时闯去反为不美，于是转身欲回，不料身后有人唤“方军长”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沈部长。

“你的部下们想见见你。既然你已病好起床，那就去见见他们吧。”方靖将信将疑：“部下们要见我——为什么？”他随着沈

部长往前走，当接近前院时，就听见许多人在七嘴八舌地乱嚷：“你们到底把我们军长弄到哪里去了嘛？”“是啊，我们好几天不见军长的面了！”他这才恍然大悟：进山以后，自己始终卧病，大概部下们以为共产党把他悄悄处置了。于是惊得面如土色，慌慌张张奔进前院，往台阶上一站，也忘记了处境，拿出了在“国军”中向部下训话的习惯用语：“大家注意！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见他突然出现，都愣住了，听他一开口，也忘了处境，习惯地就地打了个立正。“稍息！”部下们等他训话，他该说些什么呢？偶一扭头，见沈部长含笑立在身后，这才清醒过来，不禁满面羞惭：“还是请沈部长训话吧……”

沈部长含笑摇头：“不，你的部下要见你，还是你对他们讲几句吧——说说你的生活情况，也说说你对他们的希望。”方靖真是骑虎难下，感到很窘，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讲几句：“唔——这个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唔——我……我很好，你们……你们要安心……安心……安心……唔——我的话完了！”这是方靖最后一次蹩脚的“训话”。部下们又习惯地打了个立正。按军队规矩，他应举手还个礼，但他的右手刚抬到腰部便僵住了，结果是急忙转身跑回了跨院。

这一天方靖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，时而躺下，又时而坐起。因为他曾听人讲过这样一段故事：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投降以后，有一天曾国藩请他赴宴，把他的部将叫了去。这些部将虽然还是阶下囚，见了李秀成却倒身下拜，口称“大王”！曾国藩见李秀成竟尚有如此号召力，觉得此人留不得，就把李秀成杀害了。无论这个故事真实性如何，他认为“道理”是对的，留

下一个具有很大号召力的敌人，终必为乱！何况李后主的死，不也因为词中有一句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吗？联系起今天部下们对他的“关怀”，他觉得无异于将他推上了断头台，他怎能不终日惶惶呢！

沈部长经常来和方靖聊天，尤其是每天晚饭后必来与方靖挑灯长谈，听方靖说说过去的历史，在“国军”中服务的情况；象是听说书一样，兴趣颇浓。他也提出问题，如向方靖提到的某些人的情况等，但是基本上不打破方靖的话，让方靖无拘无束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。这天晚饭后，沈部长又来到方靖房里，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就关心地问：“是不是身体还不舒服？回头找军医来看看。”方靖连连摇头：“啊，不，不，我……很好很好。”沈部长注视着他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讲吧？不要顾虑，讲出来我们共同讨论嘛。”

方靖窥视着沈部长的神色，确信对方是诚恳的，这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今天早上的事……不知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沈部长看了看方靖，不禁哈哈大笑：“这件事啊，倒满有趣的。我的看法是：从一方面来看，体现了部下们对你的关系——老长官嘛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或者是‘兔死狐悲’的反应。

“来到大洪山，生活尚未就绪，你的部下还不清楚今后会受到何等待遇。在这时发现你‘失踪’了，不免疑心生暗鬼，怕我们悄悄处置了你，然后就该轮到处理他们了。所以他们不能不着急，要弄个水落石出嘛！”

方靖再一次暗叫：“惭愧！”

沈部长又说：“你也不要成天闷在房里，可以出去散散步。你是军人，大概有溜马的习惯，可以骑马出去溜溜，假如遇上赶集，也可以去集上看看——走远了一定要带上战士小李，好有个照顾嘛。”

方靖真有点不敢相信，但这是事实。他情不自禁地拉住沈部长的手，连声“谢谢”，再也想不起什么别的话来表达他的感激心情。

后来沈部长又和方靖谈起家庭情况。方靖对留在四川的一双儿女寄予深情。他说：“我有一女一儿，他们自幼失去了母亲，我一被俘，他们就无人照顾了。蒋介石和陈诚对已故将领家属的无情，我是很清楚的。以肖乾来讲，他为陈诚拉拢了不少黄埔同学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陈诚系的得力将领，但是肖乾落水淹死后，陈诚对其遗孀和三个孩子没有丝毫照顾。又如王甲本，他战死在抗日战场上，蒋介石对他的家属也没有丝毫抚卹。我为蒋介石——陈诚效命三十年之久，最后家人子女不能周全，真是死不瞑目啊！”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了。他那里知道，他被俘以后，他的副军长甘登俊公然霸占了他家的小轿车，将其家属逼得离开泸县。他手下一个叫陈志远的团长，原在军部任上校副官处长，由于扩充一四〇师时没有得到团长职务，对方靖怀恨在心，扬言要向他的家属“报仇”！吓得他的儿子躲到乡下去，不敢见人。后来他们在重庆中山一路买了一所房子住下来，国民党特务在门外设了暗岗，唯恐他们逃到解放区去与方靖团聚。

沈部长听了方靖这段话，深表同情，便安慰说：“你好好在

这里学习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考虑放你回去……”却不料方靖竟惊得跳了起来：“啊，不，不！我不想回去，也坚决不回去！”弄得沈部长莫明其妙，忙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方靖长叹一声：“你还不了解蒋介石和陈诚的狠毒啊！一九三三年第四次‘围剿’失败后，红军将俘虏的军官放回去。陈诚就对这些入破口大骂：‘你们既不成功，又不成仁，有何面目来见我！后来蒋介石召见我，也说原打算在这些人脸上烙一个‘耻’字，永不录用。我是他们的嫡系将领，既不成功，又不成仁，回去了能有什么下场吗？就是宋希濂也决不会轻饶我呀！’”

方靖的猜测是对的。当他被俘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之前，他的一个在杭州铁路分局的侄子，打电报向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询问情况，宋希濂回电说：“……令叔领管七团之众，守荆门一隅之地，竟听信谗言，自己撤离荆门要塞，以至影响整个鄂西战局……在阁下有失亲之痛，在希濂有失侧之哀……”这很可能是逃出去的詹扬清把自己擅自撤离阵地的事，转嫁到方靖身上，因此宋希濂信以为真。

衷
叹
心
服

有一天晚上方靖入厕，黑暗中窜出两个人把他抱住，使他吓了一跳。“钧座，这里的岗哨不严，离他们的司令部又远，快跟我们逃吧——我们保护你逃出去！”方靖定睛看了多时，才认出是军直属警卫营的两个排长。他忙说：“你们想错了，正因为他们不怕你们跑，才不严加看管。沈部长已公开说过：让你们在这里学习三个月，就释放你们回去。我相信决不是空话——在江西红军就是这样做的。至于我，就是逃回去也决无好下场。所以我决定不回去

了。”那两个排长见方靖执意不肯走，便叹息而去。

次日，方靖听说有几个尉官逃跑了，却不见沈部长采取任何措施，颇感纳闷。过了两天，又听说逃跑的人自动回来了。原来天降大雪，气候寒冷，路又难行，跑不动；最困难的是没有解放军的路条，走到任何地方，连一口水也讨不到，更不用说吃饭了。他不得不叹服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做到了家。

然而，使方靖叹服的又何止这一点呢？

某日早上他溜马归来，便去坡下尉官队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。在路上遇见从司令部回来的沈部长，彼此聊了几句，沈部长便陪他同去。

校官队与尉官队生活待遇略有不同。相同之处是上午半天学习，下午半天处理个人事务；不同之处是校官队有解放军帮他们料理伙食，尉官队则是从买到做都要自理。

方靖来到尉官队，尉官们正挤在一间屋里学习。他怕干扰了学习，没有进屋，只站在第一间屋檐下往里瞧。

这间屋子很宽敞，足有三十四、五平方米，周围是土炕，中间放着一张旧方桌和几条板凳，一些生活用具都乱七八糟地放在地上。方靖看了不禁皱眉：“内务如此不堪，真该打板子！”又忽然意识到处境：“唉，打了败仗，成了俘虏，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内务呢？”

尉官们挤在炕上，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。因为多数人在吸烟，门窗又紧闭，屋里烟雾腾腾；许多人在咳嗽，随地吐痰，把屋里仅有一点空地弄得脏透了，简直无法下脚。唯有方桌前坐着的一位组织学习的解放军干事，态度极严肃。他似乎不吸

烟，所以更不能忍受香烟的污染，不时掏出手帕来捂着嘴咳嗽。但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职责，仍旧在努力宣讲。

方靖在窗外听干事讲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，解放军在各战场取得了辉煌战果，不久便要渡江。正当他说得起劲时，有一个缩在炕上的人，突然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不相信你们能渡江。你们若是真的渡过了江，就杀我的头好了！”

真象一颗炸弹爆炸了，连站在窗外的方靖也受到了震撼，倒抽着冷气，连连后退。原本乱哄哄的室内，骤然鸦雀无声，几十双眼睛盯着解放军干事，好象在预测乌云滚滚的天空，一记撼天劈地的迅雷即将到来。

那位解放军干事一把抓起桌上的笔记本，攥得紧紧的，人也随之起立。但是他没有发作，先是拳头逐渐松开，随后又慢慢坐下了，以极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我们在战场上都没有杀你的头，能为你说错一句话杀你的头吗？”

那人得寸进尺，反倒坐直了，脸红筋胀地继续挑衅：“这次我们打败了，是我们军长指挥错误。你们敢放我们回去再打吗？若是再俘虏了我，就杀我的头好了！”这一回解放军干事毫不激动了，更加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一定会放你们回去的。就是再俘虏你两次、三次，我们也决不会杀你的头——解放军优待俘虏，缴枪不杀！”

那人终于缩了回去。

方靖在窗外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匆匆往回走。由于在国民党军中的习惯，方靖对于政工人员一向是藐视的（呼之为“吃闲饭的”，斥之为“卖狗皮膏药的”），所以一开始他对解放军政工

人员也嗤之以鼻。但是经过与沈部长接触，他感到解放军这位政工干部与众不同。后来又听说沈德纯是清华大学毕业的，便不禁肃然起敬：“怪不得不同一般啊！”但是，今天他看到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政工人员，竟能有如此涵养，自不免惊讶非凡了。他对沈部长说：“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的政工干部会有如此涵养！”

沈部长告诉方靖：“我们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长期的、艰巨的。那些人多数是你们军校培养出来的，又在你们部队里服务多年，有很牢固的思想基础，决不是一个嘴巴就能打掉的。在我们党的教育下，每一个干部早就认识到这一点：武装革命胜利以后，即在全国解放以后，我们更繁重的任务是改造蒋介石集团留下来的人员们的思想。这也算是一场战争吧。这场不用枪炮的战争，恐怕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和几倍的时间哩。”

方靖用心听着，虽然并不完全理解，但是他很佩服沈部长。自从与沈部长接触，他一直在观察这第一个与之打交道的共产党干部。他发现沈部长沉着得出奇，从来不见他发态度，总是以理服人。他很少长篇大论地宣传，而是以通俗易懂的言词，讲明共产党的政策。他在方靖乃至任何人面前都不讲含有刺激性的话，也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。但是，许多看来是十分棘手的事，都在他耐心说服下得以圆满解决。这一点，使信服“有理（打）三扁担，无理（打）扁担三”的方靖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蒋介石常常讲要以“精诚”感化别人，说“精诚所至，顽石点头”；方靖读过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也常常讲：“正气所到之

处，百邪自不可挡。”但是，蒋介石采取的实际行动，总是以飞机大炮代替他的“精诚”；方靖也是以“拉去睡觉”代替他的“正气”。他意想不到会在战俘营里，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的真正精诚和正气。

在大洪山被第一批释放的人，是五八〇团团长方敌的妻子和其他几个军官家属。这些妇女是由四川来前方与丈夫共度春节的。二月三日打响以后，她们随行李辎重后撤，中途被解放军俘获。

对这几个妇女，倒是方靖帮了沈部长的忙。因为她们到了大洪山，成天哇哇大哭，任何人的话都不听。解放军并不愿留她们，但是，既然俘虏过来了，就要对她们负责。当双方还在交锋时，放她们通过火线，自然无安全可言。这道理她们根本不相信。

方靖应沈部长的要求，来做这几个妇女的工作。他往妇女们面前一站，她们就不哭不闹了。她们认为：这个人是她们的丈夫尊敬的人，她们也该尊敬。其实方靖并没有多费唇舌，只叫她们耐心等待，战事一缓和，就会放她们回去。她们相信了。因为她们的丈夫听命于这个人，现在她们也认为只有这个人的话最可靠。

释放这些家属时，方靖征得沈部长的同意，写了一封简单家信请万敌的妻子带回去。无非是告慰家属：“现在我还活着，相见有日。”等语。其他的话不敢多写，倒不是怕写多了沈部长不让带，而是怕她们回去后，这封信被国民党特务搜去看了，对自己的家人子女不利。

万敌的妻子知道方靖的行李丢失，尚未找到，便将她的被子送给了方靖，说是聊表她丈夫对方靖的关心。

家属走后，沈部长明确告诉战俘们：三个月内分批释放他们。

方靖在大洪山的生活比较自由，并不要求他参加学习，只按时送些书报让他阅读。但是，他对书报有极大反感，送的人一走，他就将书报丢在地上，还要嘀咕一句难听的骂人话。这不仅因为蒋介石最痛恨军人过问政治，他已养成了不看政治性书籍的习惯；也因为感到身为共产党的俘虏，再读共产党的书报，对自己是一种侮辱，甚至最终会被共产党“赤化”！

一些部下经常到他房里来。当然，“国军”中阶级（军衔）之分极严，在过去，这些部下是不能随便去见他的；他又是个极严肃的人，部下们怕他，哪里敢去和他聊天呢？现在他希望部下们常去，可以消磨时间；部下们也知他苦闷，去了就讲些故事、笑话给他听。

转眼间方靖在大洪山住了二十余天。

某日早上，沈部长来告诉方靖：军区派来一位参谋，要求和他个别谈话。

离开大洪山

沈部长引见参谋后便走开了。

参谋对方靖说：“刘师长命我来向你了解进川的路线，希望你能提供意见。”说罢，取出军用地图摊在桌上，让方靖参考地图讲解。

解放军参谋所说的“刘师长”，指的是刘伯承元帅。刘帅曾任过蒋介石承认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，用这个称呼便于方靖

理解，或者当时还要保密，不便将刘帅当时的职务告诉方靖。

方靖已看出全国解放是必然的结果，自己讲不讲，四川也是指日可破的。因此他指着地图详细地讲了两条进川的路线：一条路线是由宜昌进攻，这是捷径，但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当年日寇便在那一带扔下大量尸体而毫无进展；况且多山路，重武器和部队给养运输都较困难。另一条路线，即是当年七十九军由湖南经贵州入川的路线，虽然曲折，但比较容易攻入四川。他还把这两条路线沿途必经之地的地形，“国军”兵力部署以及四川军队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。

参谋做了详细笔录，临行告诉方靖：“请你作好准备，过两天我们派人送你去开封——刘师长要见你哩。”

军区参谋来见方靖的事，引起了他的部下关注。他们想方设法探听情况，终于了解到方靖即将去开封见刘帅。于是当天晚上方靖屋里挤满了人，部下们纷纷打听参谋都说了些什么，想从中找到答案：刘帅要见方靖目的何在？结果也只不过是瞎猜而已。

次日起便有许多部下来帮方靖收拾行李，其实方靖几乎一无所有，所以很扫兴。

方靖的两个随从副官朱维锦、毛广荣还特地去集上买了一只鸡，炖好了送去给方靖吃，作为饯行。他们曾去找过沈部长，要求送方靖去开封，被沈部长婉言拒绝了。饭后他们各自掏出两块银元给方靖，说是路上好做零用钱。他们都知道，方靖自己从不带钱在身上，因为平日买东西或需要花钱，自有随从副官给他办。这不仅方靖如此，其他将领也是如此。因此，这些

人在被俘后，往往身上一文不名，以至想买点生活用品都极困难。

晚上，李印玺在方靖临睡前跑去，取下手指上一枚约一钱多重的金戒子送给他。

这点钱财他们过去都看得极菲薄，在当时却是极宝贵的。方靖虽然再三推辞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他想到这些人放回去后，这点钱不难到手，自己身上分文没有，倘若途中急用，确实是个困难。

李印玺有了很大进步，他已带头在门道里办起了壁报。尽管其内容不过是从报上抄录一些解放军各战场得胜消息，后面加一点简短评语，却也说明他的思想立场起了微妙变化。

李印玺对方靖说：现在龚传文继任了七十九军军长，向敏思升任了一一〇军军长，罗广文仍任第四兵团司令。这些过去方靖的老部下，都驻军四川。他建议方靖写几封信由他带回去，联合三人起义，四川垂手可得，整个西南更不在话下了。

方靖默默无言。

这一回倒不是方靖有什么顾虑，而是认为李印玺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真正至死效忠蒋介石的能有多少，这倒不必去计算。问题是直到垂亡的现在，一直抱住国民党大腿不放的人却还比比皆是。这些人效忠的目的，说穿了不过是为自己的财势而已。他们离开了国民党蒋介石便无财可发，无官可做，无威可作，无福可享，所以他们都不愿国民党垮台，要作垂死挣扎，甚至于与“党国”同归于尽。当然，到了兵临城下，无路可逃了，也会产生“好死不如赖活”的心理。将心比心，他方靖假

如至今尚拥兵四川，就是陈诚在战俘营里写信劝他起义，他也不会同意。因为他还要考虑部下的情绪，如果部下反对起义，他们一呼百应，那就谋事不成，反而会成为部下的囚犯。龚传文、向敏思盼了多少年，刚刚当上军长；罗广文是四川人，不会轻易放弃乡土。这怎么能设想他的一封信，就能说服他们起义呢？自古以来，只有城下之盟，但有一线希望，为将者不决战是不甘心的。他担心的是：李印玺贸然持信去，会被那三个当做奸细处以极刑！

方靖的揣测是不错的。李印玺被释放回去，龚传文将他逮捕，理由是：在战场上挟持军长投敌。由于证据不足，解放军又追得紧，无暇开庭审判，龚才将他放了。他回到重庆，又听说向敏思下令通缉他，吓得他逃往泸县妻子家乡躲起来，才免于难。

临行之日，尉官队和校官队排队送行。方靖觉得前途莫测，心里很乱，只是挥手告别，一句话也没有讲。

沈部长一直送方靖下山。

沈部长临别赠言

在分手时，方靖骤然产生依依之情，握着沈部长的手说：“相处二十多天，承你关照，生活上是很不错的。除感激之外，现在我也不能有别的表示了。当此临别之时，我希望你不吝赐言。”

沈部长摇摇头说：“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办事，谈不到关照。本来还应该好一些，但是，你也看到了：部队还在作战，山里条件有限，只能做到这样了。当然，如果需要，我们可以尽量想办法满足你。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当兵出身，想必困难还能克服得

了。事实证明你比较能和我们配合，这是应该肯定的。但是，关键的一步你不肯走，使我们很失望。

“当然，这件事已成过去，可以不必再提。一切寄希望于未来吧。”

“以后凡事要向前看，不要总留恋过去。你看我们现在走路，要想尽快达到目的地，只能一直朝前走，不要自找弯路，更不要回头看。否则，必然会多走里程，耽误时间，甚至丧失继续前进的勇气或者迷失方向。”

方靖没有料到，事过半个月，沈部长才对他拒绝写公开信提出诚恳的批评。但是，直到这时，他也还没有决心走那关键的一步，所以默默无言地与沈部长分手了。

一九六六年四月，方靖获得特赦后，见到了当年的沈部长，才表示后悔莫及。他问：“当时你曾说可以放我回去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沈德纯说：“我们研究过，放你回去，在西南国民党军队中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影响。当时你说怕蒋介石和陈诚乃至宋希濂不会宽恕你，其实未必如此，他们也要考虑到处置了你，会使诸将寒心嘛。除此以外，不知你当时还有什么顾虑呢？”方靖苦笑说：“项羽兵败，无颜再见江东父老——我又何颜见西南袍泽呢？”沈德纯笑了：“结果你与袍泽们再见于改造机关，你又作何感想呢？”方靖解嘲地说：“啊，我与宋希濂再见于改造机关，彼此只能以五十步笑百步！”